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群体经济利益格局的演进

●姜 力

【内容提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群体的经济利益格局在不断演进,依次呈现为利益格局均衡、均衡利益格局初步分化、利益格局加速失衡、利益失衡格局初步遏制等四个阶段。在第一阶段,以农民、个体工商户为代表的普通劳动群体明显受益,并惠及全社会成员。在第二阶段,掌控经济资源的权力资本拥有者开始明显受益,而农民由明显受益转为相对受益。在第三阶段,权力资本、经济资本、文化技术资本的所有者明显受益,多数企业职工、农民由相对受益转为相对受损或者绝对受损,下岗失业群体急剧扩大。在第四阶段,经济资本与权力资本所有者结合成受益明显的利益集团,失业群体和农民利益略有好转。

【关键词】 改革开放 社会群体 经济利益 格局 演进

中图分类号: F124.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0670(2012)11-0084-4

我国3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进程,是经济效率不断提高和经济快速发展的进程,更是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经济利益关系演进的过程。社会经济利益格局在不断地演化,呈现出四个阶段。由改革开放前平均主义带来的分配不公演化为目前的两极分化导致的分配不公,已经引起很严重的利益矛盾甚至利益冲突,成为决定我国未来发展路径的一个不可回避的焦点问题。

一、利益格局均衡阶段(改革开放之初-1980年代中期)

这是一个以农民、个体工商户为代表的普通劳动群体明显受益,并惠及全社会成员的阶段。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拉开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农村率先成为改革重点,其他方面改革试验也开始起步,计划体制一统天下的局面开始被打破,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逐渐增强,平均主义分配方式被否定。这一时期的改革是在不损害传统体制既得利益的前提下,着重进行“体制外”生产成分发展的“帕累托改善”型改革,从前的社会弱势群体和边缘群体,即农民、城市无业人员最早在改革中受益,而同时不损害另一部分人的社会福利。除了极少数成功的个体户外,并不存在过于富裕的阶层,绝大

多数人都是改革的受益者,没有经济利益受损群体。这一时期,我国的贫富差距最小,收入基尼系数由1978年的0.29连续缩小到1984年的0.24。

农民成为这个阶段改革的最大受益群体。农民收入普遍得到了巨大提高,农村贫困人口大幅度减少,从1978年的2.5亿人下降到1985年的9600万人,贫困发生率由33%下降为11.9%。^[1]从1979年到1984年,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后的实际年人均纯收入增长率,每年以双位数速度增加,这是农民收入增长最快的一个时期,也是农民收入增长快于城镇居民收入增长时期,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开始缩小。

原来处于失业、半失业状态的人群,如回城知识青年、待业青年和刑满释放人员,在政策鼓励下开展个体经营,成为我国最早的致富群体。城乡个体户的年收入一般都较高,呈现出个体收入高于集体和全民的现象。我国城镇个体工商业从业人员由1978年底的14万人增加到1981年的227万人,注册资金5亿元;1984年从业人员1304万人,注册资金100亿元。

城市居民继续享用计划经济体制的各种优惠,城市职工在“放权让利”的改革中得到了实惠,工资和奖金不断提高。虽然从平均工资绝对额看全民单位仍高于集体,行业之间存

在收入差距,但并不严重。部门间只是由于奖金和计件超额工资的增长幅度略有不同而使收入差距略有变化,大部分职工平均工资在全国平均水平上下小幅波动。

城市地区脑力劳动者虽然也分享到了改革成果,但其平均收入开始低于体力劳动者,出现典型的“脑体倒挂”现象。据1982年3月对北京市一些部门的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1982年2月收入抽样调查,发现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的月总收入严重倒置。文化程度高的脑力劳动者的收入低于文化程度低的体力劳动者的收入,企业中工人的实际收入高于企业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等脑力劳动者的实际收入,事业单位的脑力劳动者与企业单位的体力劳动者其收入倒置的状况比企业单位内部脑力与体力劳动者收入倒置的状况更为严重,^[2]知识分子收入与个体户相比,倒置现象更为突出。

二、均衡利益格局初步分化阶段(1980年代中期—1990年代中期)

这一阶段突出表现为掌控经济资源的权力资本拥有者开始明显受益,而农民由明显受益转为相对受益。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确定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改革重点从农村转向城市,以搞活国有企业为中心环节全面展开。1987年党的十三大提出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的分配制度,允许合法的非劳动收入存在,要在促进效率的前提下体现社会公平等政策主张。这些政策开始使经济利益格局分化,我国收入基尼系数由1985年的0.31缓慢扩大到1993年的0.36。掌控经济资源的权力寻租群体发展壮大成为暴富群体,农民由明显受益转为相对受益,企业职工、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主群体继续享受改革利益,知识分子群体依旧相对受益。

在放权让利和企业承包中,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经营管理者成为得益较多的群体,而与企业相关的政府部门和政府官员,作为国有资产的分配者和国有企业的实际控制者,通过租的分配,成为得益较多的群体。特别是在双轨制改革中,权力寻租群体获得了巨额收益。胡和立(1989)对我国1988年的租金价值进行了估算,计算出1988年我国控制商品的价差、国家银行贷款的利差、进口所用牌价外汇的汇差总额合计约为3569亿元,占当年国民收入的30%左右。万安培(1995)对1992年的租金规模进行了估算,价差、利差、汇差、进出口许可证管制、股份制改造和房地产开发等各项租金总额为6343.7亿元,占当年国民收入的32.3%。^[3]当然上述差额,并非完全流入个人手中,因而不能完全计入个人收入。但

其中直接或间接流入个人手中的,会占有相当的一部分,只是人们没有办法搞清楚其中的确切比例。^[4]

农民收入增长速度明显放慢。由于这期间通货膨胀因素十分明显,农民的实际收入增长率反而下降,从1986年~1993年,实际增长率均低于8%,甚至1989年呈负增长。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率总体上低于城镇居民,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处于稳中有升的阶段。城乡居民相对收入差距除了1990年继1989年城乡收入差距大幅上升之后出现回落以外,总体是逐年拉大的,1993年达到基尼系数2.80,超过了1978年2.56的水平。

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主收入继续高于公有制单位职工。1988年《私营企业暂行条例》颁布时,私营企业已达90581户,注册资本84亿元;个体工商户1453万户,注册资本312亿元;到1993年,私营企业超过23万户,个体工商户超过1700万户。

城市地区脑力劳动者平均收入低于体力劳动者的典型“脑体倒挂”现象依然存在并有所加剧。奉行市场经济原则的体力劳动者占大多数的各类工商行业部门,其收入较高;而奉行计划经济原则的以脑力劳动为主的知识分子聚集的科研、文教卫生、机关部门,其收入较低。据1993年末国家统计局数字,国民经济16个行业中按平均工资水平排列,国家机关排名第十位,文化教育单位排名第十一位。北京市统计局于1988年元月对不同工龄的脑力和体力劳动者的人均月收入做了调查,几乎各个年龄段知识分子的薪金均低于同龄体力劳动者的。^[5]

三、利益格局加速失衡阶段(1990年代中期—2000年代中期)

这一阶段突出表现为权力资本、经济资本、文化技术资本的所有者明显受益,个体工商户由明显受益转为相对受益,多数企业职工、农民由相对受益转为相对受损或者绝对受损,下岗失业群体急剧扩大。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进入了以制度创新为主要内容的新阶段,继续以国有企业为中心推进其他方面改革。先后确立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政策,允许资本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的分配政策,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这些政策使我国贫富差距上升加快,聚集财富的现象比财富扩散的现象更为突出,收入差距出现两极分化,呈现出中低收入群体收入比重下降、高收入群体收入比重上升,收入向高收入群体集中的阶层化现象,收入基尼系数由1994年的0.37扩大到2004年的0.46。

同时,财产的集中度越来越强,居民家庭财产的差别越来越大。2002年我国财产分配差距的基尼系数为0.55,已经大大超过收入分配的差距。

权力资本、经济资本、文化技术资本的所有者在利益格局的变迁中处于主导地位。国家统计局2000年调查显示:从学历角度看,具有专科学历的占城市高收入群体的25.4%,大学本科占24.6%,加上硕士及以上学历的比重,高学历者占高收入群体的比重已达一半以上。从职业角度看,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在城市高收入群体中占31%,专业技术人员占25.2%,自由职业者占17.8%。从具体职业看,城市高收入群体中收入最高的是私营企业经营者,职业股民位列第二;收入前10名中的另外8种职业是社会中介服务人员、导游、股份制企业负责人、三资企业中高级管理人员、IT行业从业人员、个体经营者、工艺美术人员、国有企业负责人等;^[6]200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问卷调查显示,收益最多的两个群体是党政干部和私营企业主。^[7]

权力资本所有者、经济资本所有者通过权力资本化、炒原始股、炒地皮、国有资产股份制改造、矿产资源变相民营化、行业的国有垄断等方式获得巨额财富。审计署对我国因腐败造成的公共投资领域的损失进行了测算:腐败造成的公共投资领域的损失、公共支出的损失、电力等行业垄断造成的租金损失、非经济的“黑色收入”等四项在2003年度达到8699亿元~12091亿元,占GDP的7.5%~10.4%。^[8]

私营企业主群体快速发展壮大,而且具有知识技术、权力背景的企业主所占比例越来越大。到2004年底,私营企业365.06万户,户均注册资金131万元。全国私营企业注册资本100万以上的共有109.11万户。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来自专业技术人员、机关和事业单位负责人以及企业负责人等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阶层的私营企业主越来越多。1997年的调查表明,私营企业主中曾担任过不同级别干部(包括村干部)的占45.2%;2002年的调查显示,曾担任过不同级别干部的占48.0%。

知识阶层由相对受益群体变为明显受益群体。城市地区脑力劳动者平均收入由持平向明显高于体力劳动者平均收入方向发展,结束了脑体倒挂,逐步进入“脑体正挂”。国家统计局统计表明,1995年科学研究、综合技术服务事业人均收入,在十二个行业中居第二位,仅次于金融、保险业。教育、文化事业、广播电视业和科学研究、综合技术服务事业职工人均年收入居第四位。2001年,以体力劳动为主的采掘业、制造业、建筑业职工的年平均工资分别是9586元、9774元、9484

元,而以脑力劳动为主的教育、文化艺术和广播电影电视业,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职工的年平均工资分别是11452元、16437元。

个体工商户由明显受益转为相对受益。大部分个体经济维持一种简单的生存型创业,在个体经济的道路上艰难谋生。这些创业者,大多为下岗工人、失去土地或因种种原因不愿困守乡村的农民,以及找不到工作的年轻人。据清华大学的调查显示,生存型创业在中国这个时期创业总量中的比例,占据了九成。

企业普通劳动者群体收入相对下降。据全国总工会2005年对10个省20个市万名职工调查,2002~2004年企业职工工资低于当地社会平均工资的人数占81.8%,低于社会平均工资一半的占34.2%,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占12.7%。

多数下岗失业者的生活陷入困境。1994年我国城镇居民贫困人口约为2062.5万人,其中,仅国有、集体企业中因失业和下岗而未能再就业的低收入家庭以及停产、半停产企业中的低收入家庭,就有450多万户、1600多万人。^[9]抽样调查显示,1999年下岗失业工人收入下降的比重高达72.4%,2000年下岗失业人员的收入水平下降的比重为42.7%,下岗失业工人收入增加的比例则微乎其微。^[10]

农民收入呈波动性增长。尽管在个别年份有较高的增长,但和80年代相比,和城镇居民相比,农民收入总体增长缓慢,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总体上仍然呈现放大趋势,90年代后期以来这种趋势更加明显。城乡居民相对收入差距连年上升,尽管1995、1996、1997年连续三年下降,但从1998年又开始攀升,2003年上升至3.23,这是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城乡居民相对收入差距最大的年份。

四、利益失衡格局初步遏制阶段(2000年代中期至今)

这一阶段突出表现为经济资本与权力资本所有者结合成受益明显的利益集团,失业群体和农民利益略有好转,既有的经济利益格局没有变化。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科学发展观”这一新理念,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放弃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思维,转而提出建构“和谐社会”。2004年以来,政策调整明显地增加了公平方面的分量,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试图使社会资源的配置向普惠的方向调整。这些政策只是抑制了差距扩大的速度,并没有改变差距扩大的趋势,收入分配差距仍在不断扩大,利益分化和资源积聚的态势日益明显,上个阶段形成的经济利益格局没有变化。

以公权力为背景的权贵集团继续把持着利益分配,竭力阻挠利益的扩散。有国有垄断企业以及不少具有官员背景的强大民营企业,以公权力为靠山和保护伞,肆无忌惮地赚取超额利润,甚至寻求非法资本回报,他们攫取了改革的大部分利益。

国有垄断行业收入增长过快过高,行业间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2006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步正发曾表示,电力、电信、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烟草等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职工平均工资的2-3倍。如果再加上工资外收入和职工福利待遇上的差异,实际收入差距可能在5-10倍之间。2010年11月,在第八届中国并购年会上,中国股权投资基金协会会长邵秉仁指出,目前七个垄断行业职工占全国职工人数的8%,而工资和福利收入却占全国总额的50%以上。^[11]同时,一些国企高管薪酬远远超过了2002年中央规定的不得超过职工平均工资12倍的界限,与企业普通劳动者的收入差距继续扩大。

房地产、矿产、证券成为“最赚钱”的暴利行业,部分官员和商人瓜分了其中的暴利。2005年全国有价出让国有土地16.3万公顷,其中未通过“招拍挂”方式出让的土地有10.6万公顷,每公顷比“招拍挂”少收536万元,除其中0.5万公顷不适用于“招拍挂”出让的经济适用房建设用地外,10.1万公顷共少收5400亿元,这成为房地产开发商的暴利和权力相关者大宗灰色收入。^[12]2009年福布斯中国财富排行榜统计,前400名富豪中,房地产商占154名;在前40名巨富中,房地产商占19名;在前10名超级富豪中,房地产商占5名。房地产行业已经成为中国财富的主要集中地。

失业者等经济弱势群体的经济状况有所好转。据民政部发布的2010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报告,2010年底,全国共有1145.0万户、2310.5万城市低保对象,全年各级财政支出城市低保资金比上年增长8.8%,城市低保月人均补助水平比上年提高9.9%。全国有2528.7万户、5214.0万人得到了农村低保,比上年增长了9.5%,全年发放农村低保资金比上年增长22.6%,全国农村低保月人均补助水平比上年提高8.8%。全年用于城市医疗救助的各级财政性资金比上年增长20.1%,用于农村医疗救助的各级财政性资金支出比上年增长29.2%。据卫生部发布的2011年我国卫生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截至2011年底,全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合人口数达8.32亿人,参合率为97.5%。

农民收入由缓慢增长进入平稳增长期。2004~2007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比上年增长6.8%、6.2%、7.4%和9.5%,这是1996年以来增速最高的时期,是历史上首次连续

4年农民收入年均增量超过300元。2004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率超过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但从2005年开始,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率低于城镇居民收入增长率,城乡差距进一步拉大。

五、结论

总之,我国经济利益格局的演化深刻地影响着改革进程。改革开放之初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均衡配置的经济利益格局使改革的阻力相对较小而动力最为充沛,得到了几乎所有社会成员的支持。现在,改革进入了一个被特殊利益集团控制的阶段,弱势群体对改革的抵制和心理不平衡的加剧,使改革丧失了基本的社会动力支持。这种利益格局如果不从根本上得到遏制,将使社会群体间经济利益的矛盾成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将降低党和政府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损害党和政府的领导能力,可能出现政治合法性危机,造成社会动荡,乃至政党、国家走向分裂,使改革前功尽弃。

参考文献:

- [1] 张新伟. 扶贫政策低效性与市场化反贫困思路探寻[J]. 中国农村经济, 1999, (2).
- [2] 何小培. 关于目前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报酬的若干调查[J]. 经济研究, 1982, (8).
- [3] 陈宗胜、李明. 关于非法、非正常收入及对收入差别的影响的研究[J]. 河北学刊, 2000, (4).
- [4] 孙立平. 关于贫富差距的深层思考与制度重建[N]. 中国企业报, 2001年10月29日第3版.
- [5] 李强. “脑体倒挂”与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两个阶段[J]. 社会学研究, 1996, (6).
- [6] 黄朗辉等. 男性、高学历者、年轻人成为我国高收入阶层主体[J]. 中国国情国力, 2001, (2).
- [7] 李培林等. 社会冲突与阶级意识[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203.
- [8] 马庆钰. 全面认识当前社会管理中的十五个矛盾[N]. 学习时报, 2005年5月16日.
- [9] 和春雷. 体制型失业与再就业: 基本的政策选择[J]. 经济管理, 1998, (2).
- [10] 王绍光、胡鞍钢、丁元竹. 经济繁荣背后的社会不稳定[J]. 战略与管理, 2002, (3).
- [11] 张宝珠、张静. 国有垄断行业高收入的形成机制分析[J]. 北方经济, 2011, (6).
- [12] 杨天宇. 调整我国收入分配关系的财政制度保障[J].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2008, (6).

[作者单位: 吉林省社会主义学院]

(责任编辑: 杨婷)